

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实践路径论要〔*〕

○ 刘 金^{1,2}, 曹康康², 黄志斌²

(1.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确立了我国新时代的重要发展路径和着力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颇为热门,但在绿色发展学理阐释与实践诉求的结合点上,对系统特征、价值取向、实践路径予以贯通论述的却不多见。从系统特征层面考察,绿色发展欲求有机整体性、立体协调性以及代际持续性的提升,从价值取向层面看,绿色发展应当以自然优先、人民至上、和谐共生为基本遵循,从实践路径层面考虑,绿色发展要落实到国土绿色规划、社会绿色转型、人格绿色美化的具体路径。三个层面一以贯之、层层展开,综合回答了什么是绿色发展,主体应当遵守哪些基本价值规范,实践中具体怎么实施的问题,有助于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

〔关键词〕绿色发展;系统特征;价值取向;实践路径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5.01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恰如是,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日趋和谐,绿色资产不断增殖,人的绿色福利不断提升

作者简介:刘金(1977—),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合肥工业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曹康康(1990—),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生态哲学原理与方法研究;黄志斌(1958—),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绿色和谐发展理论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项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其对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的成果。

的过程^[2]，它不仅集中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绿色新期待，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绿色新需要。近年来，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相关论述相对较多，但系统地、专门地将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实践路径予以贯通的阐述则比较罕见。本文意即阐明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价值取向、实践路径，并一以贯之，层层展开，综合回答什么是绿色发展，主体应当遵守哪些基本价值规范，实践过程中具体怎么实施这三个基本问题，冀以阔深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明晰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理路。

一、系统特征：有机整体性、立体协调性、代际持续性

“系统特征”揭示的是绿色发展之“本质蕴含”，即回答“是什么”(to be)的理论认知问题。绿色是自然生态有序发展的天然主色调，绿色生态还是社会生产永续发展和人类生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绿色”要义是什么呢？“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节约、回用、循环——生生、协变、臻善”构成了关于“绿色”从感性直观到知性分析再到理性综合的辩证认识进路，其中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属于对绿色之生动表象的认识，节约、回用、循环属于对绿色之基本规定的反映，生生、协变、臻善则属于对绿色之辩证本性的把握^[3]。绿色发展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范式”的突破与变革，更是对当代发展方式的绿色诠释与阔深，要求发展具有“绿色”之生机、活力、生命的生动表象，遵循“绿色”之节约、回用、循环的基本规定，切合“绿色”之生生、协变、臻善的辩证本性。然而，我们知道“系统”是事物的普遍存在且不断运行的方式，世间事物大体可以分别归属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世界，亦即划分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思维系统。绿色发展实质就是要赋予系统“绿色”特质的发展，使系统呈现有机整体性、立体协调性以及代际持续性特征，分别在结构、空间、时间等方面彰显系统的绿色演进。

首先，从结构上看，绿色发展是系统有机整体性的提升。大约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宇宙自然不断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才逐渐展现出自然界的有机整体性，形成了要素活力旺盛、彼此循环关联、整体生生不已的自然生态系统，成为了人类产生、生存、发展的物质源泉以及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物质载体。就此而言，雾霾的频发、水土的污染以及生态的失衡等当代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实即自然生态系统有机整体性的肢解或破坏，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这就决定了绿色发展必须在且应当在自然生态系统要素活力、循环关联、整体结构的维护与改善上着力，通过推进实施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来弥合遭到肢解的自然有机整体性，从而达到维系尚存的自然有机整体性的目的。进而言之，人的生存与发展不仅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而且需要生产与创造人工系统，现实中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系统交相嵌合，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这就决定了绿色发展还必须在人工生态系统生产和创造上进行着力，通过社会的以及

人的绿色思维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对象化介入与整合,增殖生态环境资产,创新创造绿色发展成果,从而丰富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最后,绿色发展对系统有机整体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人工系统有机整体性的提升及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璧合,其关键在于通过绿色科技手段的创新、运用、推广,实现社会生产在物质变换上的良性循环以及社会生活在交换消费上良性循环,并使这种循环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循环、生活消费循环与自然生态循环相耦合的超循环体系,彰显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系统的有机整体性。

第二,从空间上看,绿色发展是系统立体协调性的提升。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系统,空间上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复合体,三者内部和相互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相互作用、彼此制衡,其中某一要素和某一环节的失调、失衡都可能产生系列连锁反应,窒碍系统整体的生机,恶化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损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环境系统空间上的立体协调性是绿色发展的又一本质特征。首先,绿色发展既要在生产空间展开也要在生活空间展开,既涉及城市、企业、单位、居家诸要素也涉及乡村和交通等方面,而且生态循环及人为废弃物排放的形态多样、渠道各异,这些都需要我们统筹生产环节和生活环节资源的节约以及循环利用,兼治头上烟囱废气和脚下汽车尾气的排放,消解大地、水体、大气的立体污染链条,解决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的问题,最终达到通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优化美化,实现生态空间的优化美化。其次,绿色发展在本质上都是促使人的生产生活贴近绿色生态的辩证本性,这就需要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优化各类自然资源及其与人口之间的比例与空间的关系,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的问题,彰显“绿水青山”的生态活力、区域特色和立体协调。最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东、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从高到低的发展阶梯,这就致使绿色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也呈现不同梯次的交叉叠合,因此需要我们准确判断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水平特别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因地制宜的谋划区域绿色发展。在经济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实行特色发展、生态脱贫,在发达地区着力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向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城乡循环链接的绿色经济体系,同时支援落后贫困地区绿色发展,还要杜绝“污染转嫁”,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绿色发展的协调。

第三,从时间上看,绿色发展是系统代际持续性的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趋于自身的“好”的臻善过程,造就了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当下价值与潜在价值相统一的系统价值的增殖。生命体通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行为,护卫着自身与同类的存续,葆有着自己“种族”的生生不已。人作为万物之灵源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理所当然要超越自然生态及其生命物种,自觉摒弃“断子孙路、吃子孙饭”的发展模式而施行“修子孙路、留子孙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此外,更重要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指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贡献,也需要我们持续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筑牢代际持续发展的环境

系统的基础。就此而言,绿色发展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世代永续及人类的世代永续,这就决定了环境系统的代际持续性乃是绿色发展的题中要义。其核心在于:其一,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保护和修复良好生态环境系统,破解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环境难题,葆有后代人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6];其二,通过壮大绿色经济体和延长绿色产业链,科学规划和实施造林绿化工程以及“蓝色海湾”工程等,创造、积累更多更加优质绿色发展成果,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绿色资产;其三,通过科技绿色发展模式的创新构建,强化绿色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以及推广,提高绿色科技成果的产出比例以及覆盖程度,给子孙后代留下更有价值的创造绿色资产、护卫绿色家园的先进科技手段。

二、价值取向:自然优先、人民至上、和谐共生

“价值取向”揭示的是绿色发展之“应然规范”,即回答“应当怎么样”(ought to be)的价值引导问题。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是什么”与“应当怎么样”不存在推导关系,但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探究,两者却存在转化联系,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对人的实践方向提出了绿色要求,同样也内在的规定了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既然绿色发展欲求环境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立体协调性和代际持续性,那么人们在绿色发展实践中就应当遵循自然优先、人民至上、和谐共生的价值规范。于此,这三个规范就成为绿色发展理念在应然意义上的具体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6]“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和贯穿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其他发展理念之中,为我国当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方向,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社会暴露的问题的理性反思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自然优先、人民至上、和谐共生作为内含于绿色发展理念之中的应然规范,分别从自然客体层面、人之类主体层面以及主客体统一层面昭示了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

自然优先主要从自然客体层面体现绿色发展对自然的属意。首先,绿色发展崇尚自然之存在优先。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本身“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自然界是人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靠自然界生活”^[8]。因此,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存在,破坏自然界尤其是自然生态系统有机整体性就会破坏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第二,绿色发展强调自然之规律优先。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9]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物质基础的优先存在是潜在性存在,只有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使之成为现实性存在。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自然规律优先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人主观能动性是

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能动性,如若人类奉行自然规律之优先,将获得自然的馈赠;如若人类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则必遭自然的惩罚。第三,绿色发展追求自然之效益优先。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0]。自然界是生产的原料库,人无法创造出“新物质”,人只是有大脑的“搬运工”而已,在原有“旧物质”基础上创造着现有的“新事物”。因此,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自然效益并不属于同一序列,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在逻辑上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自然效益理应优先于其他效益。更何况伴随经济社会的绿色化生态发展。

人民至上主要从人之类主体层面凸显绿色发展对民生福祉的追求。人民至上立场不仅是对古代“神本”理念的辩证否定,更是对近代“物本”理念的理性超越。满足人民的生态需求既是绿色发展的现实目的,同样也是绿色发展的力量源泉。绿色发展对民生福祉的追求具体展现为以下几点:首先,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是一项伟大的民生工程。“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1]人民对绿色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对自然生态福祉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12]“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3]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民生之忧,群众之困,而绿色发展正是解忧之良方,它致力于营造青山常在、碧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生态环境,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真正的是在为人民解忧造福。第二,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是对人民享有环境权的维护。“在优良环境中生存是人的基本权利”^[14],生态环境恶化的最大伤害者是人民,直接损害的是人民的健康生活。因此,破坏生态环境就是对人民享有基本环境权的侵害。绿色发展之人民至上价值取向,就是要使人民“头顶着蓝天白云,在清洁的河道里畅快游泳,田地里盛产安全的瓜果蔬菜……”^[15],把清洁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看作人民的基本权利加以坚定维护。第三,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是谋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普遍性宜人作用。有机整体性、立体协调性的绿色发展可供全体人民共享;代际持续性的绿色发展可以广泛惠及子孙后代。绿色发展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是绿色发展系统特征在应然视角的意蕴转化,它要求我们要充分激发和汇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统筹全国的绿色发展,致力于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的产品、增殖更多的绿色资产,从而使人民享有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和谐共生主要是在主客体统一的层面突出绿色发展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诉求。自从人与猿相揖别以及“猿脑”进化成“人脑”之时,人类就面临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和,需要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思维模式,通过绿色发展加以协调;另外,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生态环境的呼声以及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同样要求我们壮大绿色经济、营

造绿色文化,致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优越性,给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奠定了客观基础条件。而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决定着和谐共生也应当成为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但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须从自然、人以及人与自然相璧合三个方面予以阐释方能展现其内在意蕴。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上述“自然优先”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取向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广义上,现实的自然乃是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交相镶嵌的复合体,他们在外在形式上成为人的审视对象,在内在联系上存在物理、化学、生物的相互作用,在文化意蕴上具有意义、氛围的彼此影响,因此两者外在形式、内在作用、文化意蕴协调统一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取向在自然层面的内容。其次,从人的角度看,上述“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可做进一步拓展。绿色发展终极目的固然是为了人民,使人民群众享有最公平、最普惠的生态福祉,同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力量。这就要求人民具有适应绿色发展需要的知识水平、创新创业能力和价值取向相统一的主体特质,需要我们普及、深化绿色教育,促进涵括绿色发展知识水平、创新创业能力和价值取向的人的全面发展。最后,从人与自然相璧合的角度看,我们应当视人与自然为伙伴,自觉树立“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既要为自然立法又守自然之法,既要当好自然的受益者又要当好自然的守护人,在扬弃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断裂的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协同、循环相济,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实践路径:国土绿色规划、社会绿色转型、人格绿色美化

“实践路径”揭示的是绿色发展之“实然途径”,即回答“怎样做”的具体路径问题。“系统特征”从衡量标准上诠释了绿色发展的生态要旨,“价值取向”从价值准则上揭示了绿色发展的生态指向,然而遵循切合绿色发展系统特征的价值取向,都必须也只有藉具体的实践路径加以实施方能获得现实性。绿色发展不仅在于增殖自然绿色资产、提升人类绿色福祉、和谐人与自然关系,更重要的是致力于“自然—社会—人”这个天然巨系统的和谐演化。因此,倘若将上述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以及内含的价值取向贯彻到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路径,则具体可以展开为国土绿色规划、社会绿色转型、人格绿色美化三方面的实践路径。

国土绿色规划所关涉的是绿色发展的自然路径。国土是绿色发展的空间载体,是绿色成果的展示平台,因此国土绿色规划就是在实践过程中绿色空间的拓展和绿色成果的增殖,其要点在于生态环境和人工产品的双重增绿。这需要将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规定、价值原则取向因地制宜地、恰到好处地落实到国土空间的统筹规划、综合利用以及合理开发之中,从而畅通绿色发展的自然路径。具体而言,一是要致力于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与“人为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增绿。生态系统具有缓冲和消解外界压力的自我还原与修复的自组织功能,

比如水体的净化能力、森林的氧化作用以及空气的吸附功能等等,对此我们所要做的是保护其“自我恢复”的自组织功能,重点是加大对湿地恢复和崩岸治理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而面对我国森林覆盖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状况,以及依靠生态系统自组织无法有效修复的部分,我们要“从利用资源所得到的经济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以物质和能量的方式归还生态系统,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的动态平衡”^[16],加大生态环境系统“人为修复”的力度。各地要根据国家造林绿化总体规划,遵循艺术设计与绿色设计规律,因地制宜地规划、实施绿色工程项目,协调推进城市与村镇、山水田湖与废弃矿区的绿化美化,不断拓展绿色生态空间,进而实现“自我恢复”与“人为修复”的整体耦合。二是致力于绿色产品、绿色设施、绿色生产资料的增殖,大幅提高人工绿色物品的覆盖率和品质,达到人工产品的增绿。高品质的人工绿色物品因其高度切合“绿色”的特质而能与生态系统循环相济、意蕴相恰;高覆盖率的人工绿色物品因其广泛切合“绿色”的品质而能与绿色生态空间交相辉映,将使祖国大地普遍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因此,生态环境和人工产品的双重增绿彰显着绿色发展的自然路径。

社会绿色转型所侧重的是绿色发展的社会路径。绿色发展是在社会中国进行的,生态环境和人工产品的双重增绿必须以社会的绿色转型为保障,其核心在于高水平绿色经济的发展和崇尚绿色发展社会氛围的营造。一方面,绿色发展需要壮大绿色经济实体,形成社会效应才具有现实作用。传统经济的运行是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需要藉高水平绿色经济的发展加以优化。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绿色转型升级,构建科技绿色发展模式,提高绿色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应用,优化绿色经济发展的科技供给侧;重视不同地域生态农业及乡村旅游成功模式的聚类整合、创新改进和有效推广,壮大我国现代生态农业;力行创新驱动,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和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升级特别是绿色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聚力绿色供应链构建,打造我国现代绿色服务业;拓展绿色产业链条,在城乡生态产业园区的链接和延伸上下功夫,努力形成城乡绿色经济连体循环的格局。如此便可既收获金山银山,又葆有绿水青山,实现经济发展的净化,体现绿色发展的系统特征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绿色发展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方能卓有成效。由于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加之假冒绿色产品在市场上时有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少数企业为求经济效益而至投机行为的膨胀;少数领导干部仍未走进绿色发展政绩观,未能将绿色发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些人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滋生出炫富攀比消费的恶习。如此种种,均需要通过营造崇尚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加以净化,以形成绿色发展的社会共识。这就要求我们优化市场,加大对假冒绿色产品的打击力度;优化政绩观,严格考核领导干部在绿色发展上的作为;绿化消费理念,倡行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生态友好的绿色消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将绿色发展内容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及各级各类培

训学习计划,构建绿色发展的培育普及体系;要“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17],促使绿色发展落地生根;建立示范机制,通过绿色发展共建共享典范,带动绿色发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人格绿色美化所强调的是绿色发展的人自身路径。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是构成社会的要素,绿色发展的主体是社会的人,绿色发展的社会实践要求并造就切合绿色发展的人,同时社会中的人肩负着绿色发展的任务。因此,绿色发展需要因应其系统特征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美化人格,致力人的绿色发展。现实的人都具备知识、能力以及价值等现实要素,人格的绿色美化同样也必然关涉到人的绿色知识、绿色能力以及绿色价值等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调动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和条件,拓展和加深人对绿色发展相关理论和文化知识的把握,并内化为其心智潜在模式,成为其投身于绿色发展事业的动机;其次要着重提高人的绿色创新创业能力和解决绿色发展实际问题的智慧,内化为其自身的能力,从而增强其投身于绿色发展事业的本领;最后还要着力于人价值取向的规整,将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能够做到将自身的行为动机和本领始终聚焦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从而真正的使人们成为绿色发展的奋进者、搏击者。综上,就是将人的绿色发展有机融入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塑造文化知识、能力本领和价值取向三位一体的切合绿色发展的美化人格,谱写社会绿色发展与人的绿色发展的壮丽华章。

注释:

[1][9][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2]黄志斌、姚灿、王新:《绿色发展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

[3]黄志斌、张婉、任明仑、王小晴:《科技绿色发展模式的构建理据、基本特质和实施路径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12期。

[4][7][8][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45、158、16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002版。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002版。

[12][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3、233页。

[14][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15]周生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求是》2013年第17期。

[16]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生态补偿原理与应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页。

〔责任编辑:刘 臻〕